

清代至民国时期民间借贷利率研究 ——以闽西培田为例

俞如先^{1,2}

(1.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中共龙岩市委党校, 福建 龙岩 364000)

摘要:清代民国时期, 闽西培田民间借贷领域形成了货币借贷利率与粮食借贷利率互相参照, 流行利率与互助利率互相补充的利率体系。因为粮价的周期性波动, 借贷兼营户被迫将回收的粮食本息推迟半年左右的时间出售, 保存期间增加的成本实际由借贷人承担, 粮食借贷在参照货币借贷利率的基础上, 要再追加 20 个左右百分点。培田粮食借贷利率因而趋高。

关键词:借贷利率; 追加; 趋高

中图分类号: F129=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07) 06-0064-07

On the Research of Loan Interes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king Peitian in West of Fujian as an Example

YU Ru-xian^{1,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2. Party School of Longyan City, Longyan, Fuji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ecause of the periodical price fluctuation of grain, in Peitian, west of Fujian, the loaners were forced to delay selling the grain which they got back, including principal and interest for about half a year.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creasing costs were undertaken by loanees. The annual interest rate of loaning—grain supplemented by 20 percent by referring to the interest of loaning—currency. Thus there is a growing trend in the loan interest of grain in Peitian.

Key words: loan interest; supplement; trend to the higher

借贷利率问题是民间借贷关系的核心问题。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 利率问题就已开始受到关注。有学者认为, 典当取利月息 2% 至 3% 有其学理与事实上的根据。^[1](马寅初序)但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初, 相当部分学者仍把互助借贷与高利贷相混淆, 并全盘否定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①改革开放以来, 学术界对利率问题的研究成果喜人, 不仅对互助借贷、高利贷的界定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2]而且对清代闽南和福州郊区农村流行的借贷利率水平及发生原因、我国明清时期

①史学界先后以刘兴唐、薛暮桥、王寅生和傅筑夫等为代表, 认为民间借贷就是高利贷并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

收稿日期: 2007-08-15

作者简介: 俞如先(1967-), 男, 福建长汀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006 级博士研究生, 中共龙岩市委党校副教授, 主要研究闽台关系、战略问题、客家社会经济。

吴九养 5

吴吉阶	吴德佐	远堂兄弟、叔侄	1946. 2	1946 年秋	6	9	50%	
吴骏阶								
吴福阶 6	吴德佐	远堂叔侄	1947. 2		6		50%	本谷欠至 1949 年 7 月
吴有烈 7	吴德佐	远堂兄弟	1947. 2	1947 年秋	6	9	50%	
吴伯熙 8	吴德佐	远堂叔侄	1948. 3	1949. 7	12	24	50%	按二年计息
吴瑞春 9	吴德佐	远堂兄弟兼朋友	1948 春	1949 秋	6	8	33%	
吴瑞春 10	吴德佐	远堂兄弟兼朋友	1949. 2	1949 年秋	3	4	33%	
吴福阶 11	吴德佐	远堂叔侄	1949. 2	1949 年秋	9	13. 5	50%	
吴有烈 12	吴德佐	远堂兄弟	1949. 3	1949 年秋	6	9	50%	
吴瑶阶 13	吴德佐	远堂叔侄	1949. 4	1949 年秋	6	9	50%	
吴焕潮 14	吴流芳	远堂叔侄	1947. 9	1948 年秋	3	4. 5	50%	吴流芳好赌
吴有烈 15	吴流芳	远堂兄弟	1947. 9	1948. 8	21	28	33%	借谷医治脚疾, 田产抵押, 叔父吴十养担认
吴福阶 16	吴蔡春	堂叔侄	1946. 12		3		50%	吴德佐担认并以田产抵
吴福阶 17	吴流芳	远堂叔侄	1947. 9		6		50%	押, 本谷欠至 1949 年 7 月
吴福阶 18	吴树水	远堂叔侄	1947. 9		9		50%	仍未还清, 利息按年付清

说明: 双方关系中远与非远的区别是指支房内外的不同。借贷、还贷时间的月份为农历, 一斗 20 斤。

民国中后期(土地革命后), 培田货币借贷仍维持过去的行情, 要加三利息。如吴树涵同吴建瀛打纸牌输掉之后, 向吴建瀛借银元 2. 5 元, 约定年内及时还谷 1 石(120 斤), 不算息。年后则加五偿还(本息 180 斤)。(对吴瑞春的调查, 2007 年 8 月 12 日)但这一时期, 培田货币借贷利率已突破 30% 的传统水平。如吴德佐 1944 年 9 月向吴杏辉借钱的利率即超过 30%。“民国卅三年九月初九日, 杏辉身边借来币壹仟捌百元正, 过路坑为押。民国卅四年乙酉, 秋收去银息谷陆斗正。正月初四日, 已赎回还清。”(吴德佐流水部(簿), 吴来星保存)参照当时连城县“粬谷(每 50 公斤)降为 601 元”^[5](P424)的价格, 六斗息谷值 721. 2 元, 则此次借贷利息为 40. 06%, 比清代和民国初年略有提高。粮食借贷方面, 私人间借贷盛行年 50% 的借贷利率。如表一 18 项借贷中, 除第 1 项因借贷人恃强欺弱而五年没有付息, 年利率无法计算外, 其余 17 项借贷, 年利率 50% 的 14 项, 占 82. 4%。需要具体说明的是, 年利率 33. 3% 的 3 项中(占 17. 6%), 借贷双方并无房亲关系, 利率优惠或是由于友情因素, 或是出于对借贷人身患疾病的同情。利率 50% 的 14 项中, 有 13 项借贷双方无房亲关系。第 16 项借贷双方虽属堂叔侄关系, 仍需 50% 的利息。可见, 这一时期借贷不分房内、房外, 如无交情、亲邻关系或其他特别原因, 一般按通行的行情计息。向各类民间组织借贷, 大部分利息一样较为优惠。解放前夕国民党发动内战, 导致经济枯竭、物价飞涨, 有的粮食借贷期限仅一、二个月也按 50% 计算利息, 还出现个别货币借贷、粮食借贷利息倍算的现象。(对吴柏生的调查, 2007 年 8 月 20 日)

总之, 清代至民国时期, 培田民间借贷利率相对比较稳定, 货币借贷、粮食借贷流行利率长期维持在 30%、50% 的水平上。直至土地革命前, 私人间粮食互助借贷利率(30% 左右)仍相当普遍。只是到了民国中后期, 货币借贷利率才突破传统的利率水平, 互助性粮食借贷利率也才变得较为少见, 解放前夕, 甚至出现借贷利息倍算的现象。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培田民间借贷利率的结构特点

清代民国时期, 培田民间借贷领域形成了货币借贷利率、粮食借贷利率互相参照, 流行利率与互助性利率互相补充的利率体系。民间借贷利率结构大致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货币借贷比粮食借贷利率低。培田货币借贷、粮食借贷年利率长期维持在 30%、50% 的水平上。总体上, 货币借贷要比粮食借贷利率低 20%, 但严格意义上还要更低。因为货币借贷一般是按满年计息, 而粮食借贷习惯上则不然。粮食借贷关系多发生于上半年农历 2 月至 5 月, 如表一 18 项中发生在这一时间段的就多达 11 项。待到秋收后(一般农历 9 月)再归还, 如表一 18 项中秋收后归还的就有 10 项, 实际上仅借贷半年左右时间, 行情上均按一年计息。如果超出

一年但不足两年,则仍按两年计息。如表一第 4、第 8 项。所以,粮食借贷利率如果严格按满年计算则还要高出更多。

二是合会借贷有的比信用借贷、抵押借贷利率低。合会是流行于中国民间以协同互助或共同营利为目的而结成的货币或实物借贷组织。营利性合会有一个邀集人,会员多少不等,会员凑钱或凑谷用于放贷。如吴十养于清同治年间组织鲤鱼会,并将会谷用于放贷。“(同治)丁卯十一月廿八日,曹妹借去白谷七斗(又赤谷二斗,鲤鱼会谷)。发金借去赤谷二斗(鲤鱼会)。(十二月)廿七日,杰借去赤谷六斗(鲤鱼会)。”(吴十养流水簿,吴来星保存)鲤鱼会借贷利率估计要 50%。(对吴来星的调查,2007 年 10 月 11 日)清代民国时期,培田流行的谷会则是一种协同互助组织。结会的目的是凑谷卖钱用于建房或操办喜事等。参会人数 10 人。会额固定。首期会谷全部归会首。二期至九期接会顺序,由抓阄决定。每期接会会员均收到与首期会首相同数量的会谷。若干个(最少 1 人,最多 4 人。二、三、四期分别只有 1 人出、2 人出、3 人出。五期至十期则由该期前四位已接会会员出)已得会会员按惯例要均出若干会谷,不够部分全体会员分摊,盈余部分全体会员均分。十期满会后,须再接一次会。由最后四位会员再均出若干,一部分交会首,剩余部分会员均分。该合会会首有一定的赢利,最后接会会员得利最多。会员二至会员七平均借贷利率(亏损部分与收会谷总数之比)为 21.89%。说明谷会利率比借贷经营领域利率低,且可分几次偿还,负担更轻。下面以会员 10 人每人会额 1 斗为列列表说明。

表二 培田谷会 单位:斗

期次	会首	会员二	会员三	会员四	会员五	会员六	会员七	会员八	会员九	会员十
首期	10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二期	- 3.7	10 - 0.7	- 0.7	- 0.7	- 0.7	- 0.7	- 0.7	- 0.7	- 0.7	- 0.7
三期	- 3.4	- 3.4	10 - 0.4	- 0.4	- 0.4	- 0.4	- 0.4	- 0.4	- 0.4	- 0.4
四期	- 3.1	- 3.1	- 3.1	10 - 0.1	- 0.1	- 0.1	- 0.1	- 0.1	- 0.1	- 0.1
五期	- 3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10 + 0.2	+ 0.2	+ 0.2	+ 0.2	+ 0.2	+ 0.2
六期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10 + 0.2	+ 0.2	+ 0.2	+ 0.2	+ 0.2
七期	+ 0.2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10 + 0.2	+ 0.2	+ 0.2	+ 0.2
八期	+ 0.2	+ 0.2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10 + 0.2	+ 0.2	+ 0.2
九期	+ 0.2	+ 0.2	+ 0.2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10 + 0.2	+ 0.2
十期	+ 0.2	+ 0.2	+ 0.2	+ 0.2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 3 + 0.2	10 + 0.2
十一期	+ 2 + 1	+ 1	+ 1	+ 1	+ 1	+ 1	- 3 + 1	- 3 + 1	- 3 + 1	- 3 + 1
盈 亏	+ 1	- 3	- 2	- 2	- 2	- 2	- 2	+ 1	+ 4	+ 7

说明:此表系作者在吴瑞春指导下绘制。黑体兼斜体数字为每期接会会员实收会谷。“期次”栏“+”表示收益,“-”表示应出;“盈亏”栏“+”表示赢利,“-”表示亏损。

三是房亲近邻、友情借贷比普通关系借贷利率低。培田先民深知“一室同仁休戚相关”^[6](卷首·救饥荒疏),主张贫富相济,借贷关系上给予族人各种照顾的大有人在,“代有殷实皆以好义著。”^[7](卷之终·郭隆公义仓义学记)房亲近邻、朋友间互相体恤比较普遍,其借贷利率一般较低,有的还不要利息,甚至取消债务。如清初吴锦江,“里党宗族间有不给,而造其门者辄应之。虽贷有不偿,无计焉,大有古人焚券风。”^[8](P429)又如前所述,民国前期吴继成家两次跟房亲近邻借粮食,零零星星借了好几家,利率均为 30%。民国后期互助性私人借贷虽较为少见,但也仍存在。如 1947 年农历 5 月,吴日高家向吴树俊母亲(和吴日高祖母要好)借 1 石谷子,年底还时吴树俊母亲只收 2 斗利息(利率 33.3%)。(对吴日高的调查,2007 年 8 月 11 日)

四是宗族财产借贷一般比私人借贷利率低。培田宗族财产的形式很多。以培田村为例。(1)尝田方面。既有全村吴姓族人共有的八四公尝田、文贵公尝田,也有支房子孙共有的尝田,如东溪公尝田、南村公尝田等。(2)义仓、义学田方面。既有东溪公、石泉公义仓田,又有郭隆公义学田。(3)新丁银方面。“旧规六月初六日报上者,长子谷三桶、次子谷二。”^[6](卷首·族规)(4)图银方面。图为培田、升星两村宗族世系图,图银用于正月初二举行的拜图仪式。“图银所以权子母而资修刻也。”^[8](P107)各类宗族财产中,除文贵公尝田等,因自己本身不够用而没有用于放贷外,一般均有用于出借。族产放贷均制定了严格的监督和管理规定。如图银管理,“此项公款视他项尤关紧要。理事者务择殷实公正以便生

放。借银者务要真实田契为押。三年一换,递年结数一次,至交盘之年将出入数目榜示通衢,必无侵蚀之弊,新董始可接盘。否则加倍处罚。”^[8](P107)一般都是春借秋还,有的经营有方,增值可观。如东溪公义仓,“同治己巳,倡议将所理东溪公新丁社及在敬公衣色社两处移出谷本贰百余斗,当众分领生息,春借秋偿。”后由吴震涛及侄吴迺应等接手管理。“迄今十有六载,增置田租典税贰拾余石,借项赙银壹百余两。现存仓谷贰百石有奇。”^[7](卷之终·东溪公义仓记)宗族财产借贷一般利率更优惠。如东溪公尝田租谷节余部分放贷给本房裔孙,利率一般加三。(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11日)南村公尝田租谷节余部分放贷给南村公子孙,年加三利息,外房人要借利率略高一点。(对吴柏生的调查,2007年8月11日)义仓放贷则只收加一、加二的薄息。(对吴美熙的调查,2007年10月1日)

五是会产、社产借贷有的比私人借贷利率低。为了服务公益事业、神诞祭祀和节日庆典等的需要,培田民众自愿捐资捐谷成立了形形色色名为会或社的民间社团。培田村:天后宫社,主持天妃诞辰日祭祀活动。升平社,本村玲瑚公王会期间,负责请戏班演戏。(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11日)朱子惜字社,吴泰均创建。“鸠同志五人(后加勤三人),将分回钱交化行叔生息,更名曰:朱子惜字社。……此后每逢九月十五紫阳诞辰,特祭朱文公,接祭八四公。”^[7](卷之终·朱子惜字社序)拯婴社,拯救女婴,使女婴免于被投盆溺死的组织。乐庵公衣色社,本村玲瑚公王会期间统一采购衣服兼主持祭祀乐庵公的组织。新丁社^[7](卷之终·社序),主要负责新丁银管理的组织。公益社,1908年6月成立,成立初衷是发展公益事业、振兴实业,共36股,每股3元。升星村:崇敬社,“每新正初三敬拜宗图焉。”^[6](卷首·贵长公祠记)冬至社,“祭冬至焉。”此外还有未辑入族谱的登高社(农历9月9日庆典)、青云书院社、上元社(正月十五游灯)、永义社、义仓社、茶缸社、公太(玲瑚公王又称公太)大旗会、凉伞会、香案会、布蓬会、戏衣会等。(对吴升辉的调查,2007年8月12日)培田、升星两村共有的会或社:正月十五公太会,抬里社大官巡游;四月初八公太会,抬五通神和三太祖师(定光古佛、伏虎禅师和观音);文昌社,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两村绅士齐集文武庙祭拜孔子。(对吴升辉的调查,2007年8月12日)有的社、会不经营借贷,如茶缸社。有的社或会虽兼营借贷,但利息无优惠。如升星村布蓬会清朝时就有,借贷利率都是年50%。有的只对社员借贷有所照顾。如升星村义仓社清朝就已成立,由12个小房从尝田中拿出稻谷凑合而成。一小房一份,每一小房选派一名代表为会员。放贷给社员利率有优惠,年息加三。放贷给社外人员,则年息加五。(对吴升辉的调查,2007年8月12日)但有些会或社借贷利率比私人借贷更为优惠。如培田村公益社,借钱借谷给全村的救济抚恤对象一般只收加一利息。(对吴美熙的调查,2007年10月1日)

从以上民间借贷利率结构特点不难看出,清代民国时期培田实际形成了流行利率和优惠利率并存的局面。互助借贷大量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乡族势力对借贷关系的干预(包括趋高的流行利率也须得到乡族势力的认可),“甚至关于种谷的贷借,起息的多少,也都按乡俗加以规定”^[9](P91),另一方面说明互助借贷利率本身也是存在利润空间的,否则互助借贷就不可能大量存在。互助借贷利率本身存在一定赢利空间,高于互助利率20%左右的流行利率(主要是粮食借贷利率)却仍盛行,说明流行利率无疑已得到乡族社会的认可,具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三、清代民国时期闽西培田粮食借贷利率趋高成因分析

清代民国时期,培田出现借贷利率趋高情形,主要是粮食借贷利率走高,货币借贷利率却较为稳定。货币借贷利率的稳定与货币、粮食各自在乡村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密切相关。培田农民可以没有钱,可以因没有钱而不上学、不娶媳妇等,如清末吴瑞春家两个叔父因贫穷无钱娶妻(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11日),但维持生存不能无粮,货币与粮食在培田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况且培田及周边村落盛产粮食,而且米质好。粮食大量输出,又源源不断地换回货币,使培田市面实际并不缺货币,这也有利于货币借贷利率的稳定。而粮食借贷利率趋高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

1. 直接原因

就粮食借贷利率趋高的问题,温锐先生认为这种趋高“其实都只是获取应有的市场价格收入的一种理性行为”^[3],是为了补偿一般市场价格。言外之意,粮价上涨期间,如果仍按非流行利率出借,则要吃亏,相应上调粮食借贷利率,补偿了一般市场价格才不吃亏。在温锐看来,粮价上涨是粮食借贷利率趋高的直接原因。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就意味着粮价的波动会直接导致粮食借贷利率的提高。但事实上粮食借贷利率并不直接与粮价挂钩。如表一有4次借贷发生于农历9月秋收粮价回落时节,但有3次借贷是按市面流行的50%利率计息,惟一的一次也是出于对借贷人身患疾病的同情才给予利息优惠的。清代民国时期,即使因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粮价屡见暴涨,也并不直接对粮食借贷利率造成影响。培田向来天灾人祸不断。“自鼻祖辟土斯乡,荒不一遭矣。”^[6](卷首·胜荒说)有清一代即是如此。如康熙年间,培田不仅一度备受兵荒的影响,“丁丑辛卯间,兵荒灾警。”^[6](卷首·胜荒说)而且还多次发生火灾、水灾。“丙戌年五月初一,洪水横流,淹没房屋,惟丁城尤甚,惠吉门一带城上可以行船。……丁亥年七月初十日早,明也房屋失火,止燃一家。十一月初

二日晚,火又燃。国仕公大楼上至翹林先生家下及飞龙屋一片竟成光地。惟耀宇公砌砖墙屋存焉。……辛卯三月初七日,大水灌去苗田。朋口灌去民房。米价于是渐贵。”^[6](卷首·志时变)民国时期培田天灾人祸也时常发生。(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20日)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发生,不仅使百姓的生命财产蒙受损失,农业生产也遭受影响。如康熙丁丑年(1697)九月十二日“天降严霜,晚禾尽皆不实。”^[6](卷首·志时变)光绪辛丑五月初四日的水灾,“湮没田亩无数。”^[7](卷之终·灾异记)在天灾人祸发生的年份,或天灾人祸发生的第二年,粮价上涨几倍甚至十几倍。“若乾隆六十年,米价十倍。”^[6](卷首·胜荒说)“同治甲子九月中旬,寇又到濯田,连踞南阳。次年到新泉,大败。遂逃。是年因兵数十万,米粮已尽。次年春,米价大贵,每升银三钱零。”^[6](卷首·志时变)民国时期,培田也经常遇到1元(银元)才买12斤、13斤大米的情形。(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11日)但是如前所述,培田粮食借贷流行利率却长期维持在50%的水平上。可见,粮价暴涨也不直接影响粮食借贷利率。

事实上也无须补偿,培田粮食借贷领域互助借贷大量存在,如发生于农民之间的互助借贷就无须补偿。此类借贷极为琐碎,而且是双向互助(动态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即借贷人与出借人之间先后互借,各向对方借贷一次后,完成了一次互助,借贷双方谁也不亏欠,自然无须补偿。当然,粮食借贷关系更多发生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如表一18项中,除第1、4、9、10项外,其余14项均为如此。吴骏阶、吴吉阶(双玉继子)、吴福阶、吴有烈、吴瑶阶、吴焕潮都是本村最旺的支房南村公房的地主。秋天粮价较低,地主一般不会在这个季节出售粮食,往往要等到第二年上半年,粮价回升的时候再出售。清后期,拥有培田及周边乡村近千亩田地的吴昌同,每年春天稻谷更贵的时候,才将稻谷抛售出去。民国后期拥有培田及周边乡村约两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吴建瀛也是如此。(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20日)兼营借贷的地主瞅准粮价上涨的时机,及时把回收的本息出售,谷本并没有亏。所以,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借贷关系也无须补偿。不仅无须补偿,还有谷息这一增值部分。

粮食借贷利率趋高不是为了补偿一般市场价格,而是为了补偿粮食储藏成本。秋收时节,兼营借贷的地主从借贷户手中收回粮食本息后,一般将粮食囤积在谷仓里再存放半年左右的时间,待到第二年上半年粮价上涨的时候才出售。这样不仅要投资建造专门的存放设施,包括仓楼、谷仓等。如清后期的吴昌同,“分别在罗坊的坪上村、莒溪的隔口村、乐地村建造了仓容五万斤以上的仓楼。……主体建筑的两边各建一排四个房间的横屋,其中一边作为雇请值守人员的宿舍,另一边作为仓库,建有四个大谷仓。收来的租谷一部分就近挑进谷仓,一部分挑至培田,存于场圃代聊的大谷仓。”^[10](P17)民国时期,吴建瀛也在本乡科南村、城溪村、黄沙村和朋口乡张家营村、莒溪乡隔口村、罗坊乡岗头、肖坑村建有仓楼,本村绳武楼也有他的大谷仓。建在本村之外的仓楼一般还要雇本地人看管,甚至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损耗,这样无形中增加了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转嫁到借贷人身上,也因此粮食借贷利率在参照货币借贷利率的基础上,要再追加20个百分点。正是额外增加的成本直接导致了培田粮食借贷利率的趋高。

2. 间接原因

从根本上讲,培田粮食成本的额外增加又与培田及周边一带粮价周期性波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换言之,粮价周期性波动间接地导致培田粮食借贷利率的趋高。粮价周期性波动根本上是供求失衡造成的。春夏之交,粮食供应不足而需求旺盛,直接助推粮价的高涨。

就粮食需求而言,清代民国时期,由于农民贫困化一般规律的作用、民国前期军阀的掠夺、民国中后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搜刮,培田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每况愈下。如清后期吴龄均家曾有余钱出贷^①,但至民国前期却已今非昔比,其孙吴树兼(吴德佐)反而沦为借贷人。有1940年补立的字据为证:

立收还银青(清)字人老九、鸿谷、树俊、发生等今收到十养代赎树兼手所借鸟屎窠为押之田当日原借小毫贰百角正,自愿赎回大洋拾元正,日后不得借口未曾还青(清)。二比甘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收还青(清)字照。

一批树兼原押借字一纸,老契壹纸因红军蹂躏失落,日后寻出不得行用批明是实

民国廿九年庚辰五月廿九日立 收字人老九、鸿谷、树俊、发生等笔(该字据吴来星收藏)

民国后期吴德佐一家的生活一度陷于困境。自1946年起到1949年,借贷次数逐年增多,甚至1949年一年借贷多达四次。(见表一)又如住双善堂的吴泰均与堂兄吴贡均后裔清末民初经济条件一直还算宽裕,但至民国后期,住双善堂的16户人家(包括树俊、石春、树春、树浓、顺发、水明、华生、万生、发生、鸿举、旺生、流生、振明、振熙、国生、春保等户),却大部分家庭生活窘迫。仅3户(外出谋生)有少量土地出租,其余13户均要租田耕种,青黄不接时还要借贷维持。(对吴水明的调查,2007年8月11日)陷于困境的培田农民有的缺粮一、二个月,有的缺粮长达半年。(对吴瑞春的调查,2007年8月12日)每年春夏之交,由于农民断粮的原因,培田粮食需求量陡增。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培田这种由于农民日益贫困

^① 笔者在吴龄均的曾孙吴来星家看到一张同治五年(1866)的典当字据。该字据写明,升星村吴世耀、吴世苗向吴龄均借钱叁仟柒百文正。

导致的对粮食需求量季节性增长的现象,在我国其他乡村也极为普遍。

就粮食供应而言,培田及周边一带村落原本盛产粮食,粮食供应却严重不足,这与培田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培田周边县域普遍缺粮。如与培田近在咫尺的连城县长期缺粮,“历史上,连城县粮食一直不能自给,须从清流、宁化等邻县调入。”^[5](P398)上杭县也不能自给,“解放前,上杭粮食不能自给,靠商贩输入江西米和潮汕进口米调剂。如遇灾年,则多由地方政府出面,大量从外地转入粮食。”^[11](P397)永定县也是如此,“即糞多力勤,风调雨顺,早晚两获,谷不满四十万石,米半之,总五里生齿不下二十万,除工商之类食于外者,仍十五六万人,岁米二石,常少米石十余万”。^[12](卷2•P64)与闽西经济联系密切的岭南一带也严重缺粮。汀江、韩江流域等缺粮区域大量地借助汀江、韩江干流、支流航道调剂粮食。“惟米食仰给于江右之赣宁,而杭永及潮又往资贩余于郡,稍留滞乏继,市价踊腾。”^[13](卷30•风俗)地理位置上,培田正好与这些缺粮区域有水路、陆路可通。培田与连城有汀连官道相通,相距20公里。至上杭、永定和广东则可通水路。培田的粮食挑十几里山路,到朋口上船,途经新泉溪、旧县河,然后在上杭县城东进入汀江,顺流而下在峰市再换驳船可进入广东韩江,或自峰市上岸可达仅几步之遥的永定县。清代民国时期,培田地主在朋口及其附近乡村拥有大片田产,并在多处建有仓楼。收获的租谷存放仓楼。粮食价格看好时,就近卖给粮贩,部分出借给当地农民。粮贩收去后,在朋口加工成米。每逢二、六墟日,新泉一带米商或上杭县米商雇新泉船工撑船到朋口收购大米。每墟都有几十条船停靠朋口,每船装载四、五千斤粮食,大部分贩卖到上杭县和广东潮州一带(抗战期间则主要卖往梅县一带)。因新泉也缺粮,也有少部分卖到新泉。培田地主在当培田谷仓的稻谷,则雇人舂成米,再请人挑到本乡科南墟市去卖,相当部分卖给朋口米贩。(对吴柏生的调查,2007年8月20日)平常年份培田周边缺粮地区粮价都高于培田,培田地主的稻谷很好卖。(对吴生涛的调查,2007年8月12日)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培田粮食自然要借助于上述航道大量流入这些地区。如此,反使培田这样盛产粮食的村落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矛盾的一边是培田及周边一带粮食大量外流,而天灾人祸频繁发生,直接导致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矛盾的另一边却是每年春夏之交粮食需求陡增,供求失衡的状况因而发生,直接推动了粮价的高涨,并间接导致了粮食借贷利率的趋高。

综上所述,清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培田民间借贷盛行,并形成了货币借贷利率、粮食借贷利率互相参照,流行利率与互助利率互相补充的利率体系。因培田的地理位置便于粮食输出而且大量粮食流出等原因,培田及其周边一带粮食供求严重失衡,导致粮价周期性波动甚至大幅起落。这就迫使粮食借贷兼营户一般要将借贷户偿还的粮食本息推迟半年左右的时间出售,保存期间增加的成本实际由借贷人承担,粮食借贷利率也因而被抬高,反比货币借贷利率高出20%左右。培田粮食借贷利率之趋高具有一定地域特点,在闽西汀江流域农村较为普遍。

参考文献:

- [1] 宓公干. 典当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2] 黄冕堂. 清史治要[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0; 张忠民. 前近代中国社会的高利贷与社会再生产[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2, (3).
- [3] 温锐. 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J]. 近代史研究, 2004, (3).
- [4] 俞如先. 论闽西培田文化的时代价值[J]. 龙岩师专学报, 2004, (5).
- [5] 连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连城县志[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3.
- [6] 光绪渤海吴氏族谱[M].
- [7] 光绪培田吴氏族谱[M].
- [8] 陈日源主编. 培田: 辉煌的客家庄园[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
- [9] 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10] 俞如先. 培田: 中国古村落[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4.
- [11] 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上杭县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 [12] 乾隆永定县志[M].
- [13] 光绪长汀县志[M].

(责任编辑: 戴利朝, 黎 芳)